



# 中日网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 明初的中日关系与寓滇日僧

发布时间: 2009-12-03 点击次数: 510 作者: 古永继

摘要: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佛教僧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初期,中日交往尚未正常化,已有日本僧人名留云南史册,为丰富当地文化宝库及发展中日关系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明初;中日关系;寓滇日僧

云南与境外岛国日本,两者远隔千山万水,当省外各地通过与日本的交往而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多彩的篇章时,僻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却默默无闻,及至近几十年日本学界兴起到云南的“寻根热”后,两地间的联系似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已有日本僧人活跃于云南,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页。明末清初钱谦益所辑明代《列朝诗集》载:“国初,日本僧人贡者,多遣滴居滇南。(1)明初寓居云南的日本僧人,有如瑶、机先、天祥、大用、演此宗、斗南、宗拗、昙演等人,其至滇原因及在滇状况不一,从中反映出当时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佛教僧人对促进双方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发展迅速,隋唐时形成一个高潮,从而使其成为日本学习盛唐文化的内容之一,也使中国成为日本吸纳佛教的重要中转站。日本遣唐使中大批学问僧的加盟,中国鉴真和尚的六渡扶桑等,均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千古盛事及佳话。

佛教于六世纪初经中国及朝鲜传入日本,其后渐与其原有的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相融合,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古代的日本僧人,不但是研究佛教经典的行家里手,还是熟悉和掌握先进汉文化的儒者、诗人、书法家和艺术家,同时也是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中担负重任的主要使者 and 外交家。有学者指出,在历代的中日交往中,“日本正副使臣很少是职业外交官,多数是熟悉两国情况的僧人、商人或学者,尤以僧人为多”。(2)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吸取元代征讨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等国而失败的教训,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采取和平外交政策,意图通过稳定人心及恢复传统的“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关系,(3)达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而树立自己“天下共主”的形象;并为此专门下诏礼部,对国内外人贡者给予薄来厚往的优待:“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责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4)致明初不长时间,周边及海外国家、地区纷纷遣使入京朝贡。但在与日本的交往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及现实因素,双方间的关系一直难以正常。在早先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失败后,中日官方交往断绝,“终元世,未相通也”。(5)元明朝代兴替之际,日本也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北朝以幕府将军足利氏控制天皇而掌政,南朝则以征西将军怀良(中国史籍多误作“良怀,”)亲王掌权而自成一体。至明初洪武时,双方对彼此国情的变化尚不明了,而此期间的中国沿海地区,则不断遭受日本海盗的侵掠寇扰:洪武二年(1369年),“楼寇复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劫夺货财,沿海皆受其患”。(6)三年六月,“楼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7)五年三月,“楼夷寇海盐之椒浦,杀掠人民”;同年八月,“楼夷寇福州之

福宁县，前后共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8)等等。尽管洪武二年朱元璋即派出使节，要求日本“奉表来庭”，或自安境土、制止寇盗，否则便要“代天伐不仁”，派大将“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9)但朱元璋将日本视为统一国家而不知其南北对立现状，本欲与天皇联系却找到怀良亲王，故目的难以达到；怀良亲王则将明廷认为是元王朝的继续而拒绝交往，杀害及拘禁了部分明朝使者。后来双方虽逐步明白了真相，但交往中仍磕磕碰碰，难以正常。另外，日本一方面南北双方暗中猜忌相互拆台，另一方面则反感明朝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态，不愿再完全恢复以前旧的藩属关系。因而倭寇对中国的侵扰行为，长期中断断续续并未真正停止，加上当时遁人海岛的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反明势力与倭寇勾结而不断加大骚扰力度等等，终于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开始多次下令禁止私人出海，最后形成了对明代社会及中外关系影响极大的“海禁”政策。但尽管如此，此期间中日两国僧人在建立双方的互动关系及信息沟通方面，仍以其特殊的身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同时送回被明朝擒获的日本海盗、僧侣等十五人。南朝怀良亲王在明使的谴责及诚意打动下态度有所转变，于次年“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10)朱元璋厚赐日本使者，从祖来口中证实了不久前从元末至南京佛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处了解到的日本国情，认为“其俗尚禅教，宜选高僧说其归顺”，(11)遂于洪武六年派明州天宁寺主持僧仲猷祖阐、南京瓦官寺主持僧无逸克勤等人送使者还国，同时与北朝取得联系。但祖阐等人在归途中拜访怀良亲王时，又被其拘押一年多。此后明朝与日本南北双方均保持往来，日本亦多次派僧人为使人贡，其中并杂有一些假借朝贡之名冒充使者以图赏赐及贸易厚利者。朱元璋曾因日本使者“无表文”、“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及“表词不诚”等而恼怒，多次辞却日使人贡。(12)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丞相胡惟庸以谋反被诛，罪名之一为勾结日本。(明史)载：“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滴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人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13)所涉通楼案，今学者多有考证，认为乃朱元璋为丑化已死的胡惟庸而炮制的假案，此不赘言，而如瑶被牵连惩处，则将明初日僧与云南开始联系在了一起。

历史上的云南，被称偏远蛮荒瘴病之区，中原人视为畏途，而其位处西南边疆，接邻东南亚各国，地广人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平定云南后，明廷即通过各种方式人迁大量外地移民，在军士留戍要地、平民行政安置之外，还有相当部分的贬滴官吏和充军罪犯等。

有关如瑶发配云南事，《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七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如瑶等贡方物及马十匹，上命却其贡，”；(14)《续文献通考》云：洪武十七年，“如瑶又来贡，坐通胡惟庸，发云南守御”。(15)可知如瑶曾两次出使中国，最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被发配云南，成为明初日本僧人发配云南的第一人，也是当时史籍中唯一确载的日僧滴滇者。

永乐、宣德间，代镇云南的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西平侯沐英第三子沐昂，结交在滇文士，编纂云南最早的诗歌总集《沧海遗珠》4卷，辑有明初宦于滇、滴于滇的名士朱经、方行、朱琳、曾垣、周防、韩宜可、王景彰、楼璉、王汝玉、逮艇、平显、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张洪、范宗晖、施敬、僧天祥、僧机先、僧大用21人的诗作270首；作者姓名之下，各注其字号里居。对僧天祥、僧机先、僧大用，则明言其为日本人。(16)

机先，或作鉴机先、释机先、僧机先。钱谦益《列朝诗集》说：“鉴机先，日本人。先有《滇阳八景》云：‘岂料长为南窳客，朝朝相对独为翁。’国初，日本僧人贡者，多谴滴居滇南，故沐氏得录其诗也。胡《挽鉴机先》诗云：‘日出扶桑极东处，云归滇海最西头。’知机先段于滇也。”(17)胡粹中，浙江山阴人，博通经史，洪武时以事安置昆明，永乐间调任楚府长史，著有《元史续编》77卷。(18)扶桑为旧时日本的代称。钱氏根据两人诗句分析，证明机先为明初日本滴居僧人，去世于滇，言之成理。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旧本四僧塔，在龙泉峰北润之上。逮光古、斗南，其二人失其名，皆日本国人，元末迁滴大理。皆能诗善书。卒，学佛化去，郡人怜而葬之。”(19)诸葛元声万历《滇史》卷9载：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旧本四僧居大理者，同日化去。四僧：逢光古、斗南，其一机先也。元末迁流大理，皆能诗善书，郡人怜而葬之。……机先有《滇池诗》云：‘滇池有客夜乘舟，渺渺金波接素秋。白月随人相上下，青天在水与沉浮。遥怜谢客沧州趣，更爱苏仙赤壁游。坐倚篷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州。’，《滇史》之说似本于万历《云南通志》，且纠前者“逮”之误为“途”及补出四僧之一为机先，当是；但将元代前中期的至大年间称为元末，则误。逮

光古实非元人，更非日僧，乃河南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人途艇。天启《滇志》云：“逮叔，字光古，怀庆人，洪武初戍滇。通经术，能诗赋。所著有《方外集》。”(20)机先所作《滇池诗》，天启《滇志》卷28《艺文志》中亦有载，两者完全一致，且署名作者为“本朝释机先”。另《枪海遗珠》中，并载有胡粹中、僧机先《挽途光古先生》及日僧大用《挽途光古》诗。可知机先等均为明初洪武时人且相互交往密切，而与元末无关，也非同日而卒。机先的贬滴身份当可无疑，但元代中后期中日间已无官方往来，不存在日本僧人被迁请云南的条件及可能；如果其于元末被贬，至明初改朝换代，羈絆之身自然已得解放，大可远走高飞脱离苦海，不必再发“岂料长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之声。李元阳、诸葛元声二书，于此记载均不确。

天祥、大用，《枪海遗珠》虽注明为日本僧人，但史迹不详。《枪海遗珠》录天祥诗11首，从诗中内容，可知其曾于杭州、长安等处滞留，从川、黔进入昆明、大理，结交友人不少，其或为明初日本游方僧人。大用，《枪海遗珠》仅录其《挽途光古》诗一首，可知其与途叔相交甚厚，与机先、天祥为同时代之人。

演此宗，《枪海遗珠》卷1有曾垣《赠日本僧演此宗》诗：“达摩居篙九载期，此宗寂寂有谁知？生从日本精三藏，老向云南礼六时。香满墨池临旧帖，花明春坞咏新诗。别来应有惊人句，好奇东风慰所思。”另有平显(寄演此宗)诗：“秋风起江汉，纤月在西南；影落清滇水，凉生白石完。唱酬蔬笋气，梦寐葛藤谈；未遂依禅寂，徒惭雪满替。”(21)曾垣，字日章，翰林学士，洪武年昆明安置。平显，字仲徽，浙江杭州人，洪武初授广西藤县令，以事降主簿，不久滴戍云南，以博学能文，西平侯沐英请于朝，除军籍，聘为塾宾。(22)两诗中反映出，演此宗为戒律精深的日本僧人，至云南时年事已高，工书善诗，与当地文士为友，常以诗书文章唱和。

斗南，为大理四僧塔所葬日僧之一，与明初云南文士多有往来。(《枪海遗珠》卷2录楼璉《送镜中照上人兼柬斗南和尚》诗：“旧住扶桑第几山，偶然踪迹落人间。萝衣拂露辞秋壑，藤杖扶霜度晓关。滇海飞来孤月小，点苍留得半云闲。殷勤为报圆通客，鹤背清风好共还。”同书卷3载杨宗彝(谢斗南禅师惠竹杖)诗：“扶桑禅子下蓬莱，携得仙人竹杖来；瘦节只疑同鹤骨，虚心犹恐是龙胎。衰年正赖扶持力，异日须知变化材；不怕石头溪路滑，月明随意步苍苔。”两诗中均将斗南与“扶桑”相连，确指其系日本僧人；而与斗南并列的镜中照上人，当也同为“扶桑”高僧，惟其名仅此一见。楼璉，浙江金华人，曾从宋镰学，历官蓝田知县、广东道御史等，洪武间滴戍云南。后召还，建文时任侍读。永乐初成祖篡位，命其起草诏书，不敢拒命而自杀。著有《居夷稿》。(23)

宗鋤、昙演，二人均寓居昆明，似为游方而至的驻锡高僧。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圆通寺，在城中螺山之下……其内有轩，曰翠微深处；有楼，曰古木回岩；皆日东僧所建。”并于其下录有都事吴存敬诗云“上人生自扶桑国，结屋云山第几重。……”随后另有宗渝诗：“翠微深处乱山中，筑室闲倚桂树丛。夜榻泉鸣口润雨，晓园花落满林风。窗含细霭衣常湿，桥拥浮搓路口通。异域十年天万里，几番归梦海云东。”(24)可知日东僧指的正是宗鋤，他寓居海外异国十年，多次梦中归返遥远的故乡，于圆通寺建有“翠微深处”轩及“古木回岩”楼，为人们所称道。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有云：“聚远楼，在五华山泰然堂之南，先时日东僧昙演所建。凡滇南之景，一览俱在。后定边伯乐其胜，乃重修之，以为游观之所。”其后有平显酬赠诗：“……僧游海藏受斋归，小笠轻袍航一苇。……扶桑亚风掀海立，金马腾骧脱其紫。……”(25)昙演同宗渝一样，出自扶桑，与当地文士交往密切，并成为其诗中吟咏的对象。

除以上诸人外，尚有大理感通寺的桂隐、南江，亦同为明初来自“旧东”的僧人，在与当地白族学者的诗文唱酬中留下了迹印。(26)

明初日本僧人在云南的状况，折射出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及其时代特点。

首先，此时期中日双方均处于国内局势擅变及朝代更替阶段，之前数十年交恶留下的隔阂和猜忌，使得彼此间的来往需有一个相互了解及磨合过程。刚打下江山坐上帝位的朱元璋，难以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在明廷所派使者曾经被杀、沿海地区楼寇侵扰难止，以及对方涉嫌参与明朝大臣叛乱阴谋时，“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失去约束力，尚处于非正常关系中的对方使者自然成为政坛事件的替罪羊和牺牲品，被抛入贬滴队伍而成为边疆移民中的一员。

其次，中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官方交往停滞之时，民间的相互往来却从未间断。地位特殊的日本僧人，除了充当使者，还有相当部分以私人身份进入中国。这些来访的日僧，尽管入明途径及从事的活动不同，但学习中华文化、沟通两国信息则大同小异，在发展双边关系中发挥了桥梁和润滑剂作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和传播者。

最后，入明日僧大多汉文化功底深厚，不论是厠居一隅者、游历四方者或驻锡古刹者，宗教之外，往往从

事相关的文学活动;他们与所在地僧人及方外儒士、儒官关系密切,相互间切磋交流,酬赠唱和,所见所思尽人诗篇,从而辉报文坛、留迹史册,为当地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推动两国文化的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注释:

古永继,云南大学西南边班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第六《小传》。

(2)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日本学论坛》,1987年第1期。

(3)《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60

(4)《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540

(5)《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6)(明)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卷2《日本》。

(7)(明史)卷2(太祖本纪二)。

(8)《明太祖洪武实录》卷73,75.

(9)(明太祖洪武实录)卷390

(10)《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11)【明】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卷2《日本》。

(12)《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13)《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14)《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380

(15)【明】王析:《续文献通考》卷234《四裔考·东夷·日本》。另,明郑晓《皇明四夷考》、何乔远《名山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明大浩三篇》等亦作此说,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则云发陕西,明王世贞《日本国志》云发陕西、四川,明焦兹《献征录》则说如瑤所率精兵尽被诛夷。

(16)见《沧海遗珠》卷首序及各卷篇目。

(1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第六《小传》。所言“八景”,实为“六景”之误。雍正《浙江通志》卷180(人物六·文苑三)。

(18)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志·大理府·古迹》。按:“逮”为“逢”之误,途光古即通祖,非日本人。

(19)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

(21)《枪海遗珠》卷20

(22)(《沧海遗珠》卷1、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

(23)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明史》卷141《方孝猫列传》。

(24)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寺观》。

(25)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楼阁》。

(26)见王叔武《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按:此文及孙太初《明初流寓云南的日本僧人》((《思想战线》1980年第3期),同为研究明代富演日僧的力作,笔者撰写本文多有参考。

208西南边经民族研究(第6辑)

(原文转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 编辑:秦利明)